

呼唤真实

——新闻传播研究文存



张学洪 ○ 著

这是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围绕新闻改革和舆论引导两个议题所写下的一些文字，反映了当时我对新闻媒体脱离群众的深深忧虑和对新闻传播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殷切期盼。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张学洪：

呼唤真实

——新闻传播研究文存

自序

这是我在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围绕新闻改革和舆论引导两个议题所写下的一些文字，反映了当时我对新闻媒体脱离群众的深深忧虑和对新闻传播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殷切期盼。

这辈子我从事新闻工作很是偶然。解放前我读高中时本想毕业后读大学工科将来当工程师靠专业技术吃饭。可还没等到高中毕业，在高三上学期结束的寒假里泰州就解放了，解放后在泰州中学继续读了一学期才毕业。我请在上海的表哥替我报名几个上海的大学准备去考，可表哥没替我报名，劝我当年暂时不考，因为他觉得解放后大学情况变了，不像解放前只要考上国立大学读书不花什么钱，吃饭有公费伙食。解放后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像我这样非工农家庭出身的人能

否申请到还不知道。眼下我家庭经济情况并不好，恐怕不能负担我读大学，劝我等一年再说。这时我父亲和朋友合股开的一家小布店经营情况很不景气，每月收入只够维持家庭日常生活，我怎能要求家里勉强供我读大学呢。可是就这样待在家里吃闲饭怎么行？我十分苦闷。在毕业离校前，一天校长张人俊同志告诉我，苏北日报正在招考编辑，建议我去试试，于是我去报名应考。考试内容是高中数学、政治和语文。参加考试的有30多人。可是考试后迟迟不见发榜。这时设在泰州的苏北建设学校招生了，这是一所专门招收青年知识分子培训新解放区急需干部的学校。我的几个要好的同班同学都去报了名。当时在同学中流行一种风气：参加革命最光荣，考大学落后自私。于是我也跟大家一起去报了名，而且很快被张榜录取了，接着便和几个同学一起打起背包跑到十里路外的农村进校学习。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校，而像一支游击队，学员分散住在农民家里，按编队蹲在广场上吃饭。我读教育系，被编在四队。队长、指导员就是直接面对的老师，也是直接的领导者。学习活动主要是听全校性的时政报告，然后由队长指导员带回进行小组讨论。大约过了一个多月，苏北日报招考编辑在报纸上发榜了，就录取了我一人（后来听说因上级分配了十名华东新闻学院毕业学员来了），通知我去报到。我便报告队长、指导员和校部，被批准长假离校到苏北日报报到上班。从此我就踏进了新闻工作的大门。说起来十分幼稚可笑，报到时我还对接待我的领导人说，我还想考大学，希望能允许我在空闲时间复习功课。领导人是一位温和慈祥的老革命，微笑说可以可以。

刚开始上班，我只能跟在老同志后面做做辅助工作，给通讯员和通讯站写信联系组织报道。一年后抗美援朝了，我被调到编辑部做编采工作。工作节奏很紧张，任务很重，几乎天天加班，然而我并不觉得累。差不多每天都有我采编的稿件见报，并且常常得到同事和领导的夸赞。慢慢地我爱上新闻工作了。

1952年苏南苏北合并成立江苏省，原苏南日报苏北日报撤销，合并到南京新华日报成为省委机关报，我随之调到新华日报工作。先在编辑部做编辑，后来又调到松江地区记者站做常驻记者。1955年六月在记者站任上，突然调我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刚刚成立的新闻系学习，本科四年，是在职进修性质，待遇相当优厚了，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终于圆了大学梦，只是不是读的理工科。

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整风运动。我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在班级座谈会上陆续地随意谈了过去几年我在苏北日报、新华日报经历的三反、肃反运动中的一些情况和意见以及我对我国民主法治、干部作风、工资分配等方面问题的看法，结果我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我被调回报社接受组织处理，下放农村监督劳动。在农村我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亲身感受了这些年基层人民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文革”结束后，1979年春节刚过，新华日报派人来向我宣布撤销当年划我为右派的处分决定，恢复我的政治名誉、党籍和原工资待遇。可是我失去的青春却再也无法恢复了。当了22年右派这时我已49岁了。1980年我回到南京工作，先在一所高校办校报，

1982年才调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从事新闻学研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各行各业都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热潮。新闻界多年来中“左”毒最深，群众意见很大，也开展了新闻改革。新闻学研究也理所当然地围绕新闻改革展开。改什么，怎么改，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业内多数人的看法是：我们的新闻报道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可读性差，不受读者欢迎。这在全省大规模受众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这种状态并非哪家媒体所独有，而是普遍现象。因为过去在我国所有媒体都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担负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承担着社会大众教育者、指导者的职能，这就养成了媒体常常以上司自居、板着脸孔说话的习惯，自然不受欢迎。这种状况由来已久，是从过去解放区党报的办报传统沿袭而来，到“文革”便发展到极端，媒体成了极左路线整人的工具。因此，新闻改革必须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入手，重新学习新闻学的基本知识，摆正媒体与受众的关系，树立为受众服务的观念，按新闻规律办事。80年代新闻改革之初，人们提出了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等概念，试图以此来软化媒体生硬的形象，但效果有限。我怀着满腔激情大声疾呼新闻改革必须首先更新新闻观念，放低身段为受众服务，党性、指导性只能寓于媒体的服务性之中。我在不同规模新闻学术研讨会上反复论证我的这个观点，并写成论文在不同刊物上发表。《经济报道的改革与新闻业的大趋势》一文就是在1986年春天写好拿到江苏省新闻学会学术年会上交流的。文章从当时涌现出的一些经济信息类报纸深受读者喜爱说起，论证新闻业的根本社会职

能是为受众提供信息服务。新闻媒介的党性、指导性只能寄寓在信息服务之中，决不能取代信息服务这个根本职能，否则就成了单纯的宣传品和教科书了。这在今天看来是极普通的常识，可当时在会上却引起了激烈争论。一位持反对观点的省报编委竟说：“指导性是最大的服务性。”一句话就彻底否定了服务性的生存权，可见那时新闻改革面临的阻力有多大。这篇论文几个月后我带到全国新闻学会第一次学术年会上交流，并被选编入大会论文选集《新闻学论文选》一书中。论文《论新闻改革的必要性及其方向》是我当年年底在宁镇扬新闻学会年会上的发言稿，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新闻改革必须首先更新新闻观念的思想。这次会上没有发生争论，标志大多数人已与时俱进了。

随着新闻事业企业化改革的推进，媒体把吃财政饭的铁饭碗换成了吃广告饭的金饭碗，受众成了衣食父母，谁还敢高高在上教训受众？大家都争着为受众服务好，竭力讨受众喜欢，从而提高报纸发行量和广播电视收听收视率。然而后来有的媒体为讨好受众却走向了反面，用低俗下流的东西来迎合一些受众的低级趣味，污染了社会空气。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从1987年“反自由化”开始，提出了舆论引导问题。于是我把注意力转向社会舆论和传播效果研究。在省里召开的一次小型座谈会上，一位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同志面对社会上自由化思潮泛滥不无感慨地说：“真理（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们手里，工具（指报纸、广播、电视等宣传工具）在我们手里，舆论却不在我们手里！”这确实值得

人们深思。不是吗，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真理，我们拥有数量可观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强有力的宣传工具，可是我们有时却不能有效地影响社会舆论，我们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我觉得他提出了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大课题。它需要研究和回答如下一系列问题：社会舆论和社会思潮是什么？是怎么形成的？两者之间关系如何？新闻传播能对它们发生影响吗？如何发生影响？影响力能有多大？很快我把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整理成一篇文章《舆论宣传的困扰和出路》发表在《社会学探索》和《江海学刊》上。接着我所主持的“社会舆论与大众传播”研究课题被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确定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不久，我又被邀请参加由中宣部新闻局牵头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新闻事业与现代化建设”研究，具体承担其子课题“新闻传播效果”的研究。历时三年，前一个课题的最终成果是一本专著《舆论传播学》（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出版），后一个课题的最终成果是《新闻传播效果研究报告》，作为整个研究项目的分报告被收入该项目的最终成果《新闻事业与中国现代化》（新华出版社 1992 年出版）一书中。

在对社会舆论和新闻传播效果的研究中，我着重研究了这么几个问题：社会舆论的本质与基本特征是什么，社会舆论是怎么形成的，大众传播效果该如何评估，它能否影响社会舆论，其作用机制是什么。我的主要结论是：社会舆论是公众对所关切的问题的社会态度在公开议论中的表现。它的核心是公众的社会态度，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归根结底是由

社会存在所决定。所以说，人的社会态度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给人以各种信息刺激（包括切身体验、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从而形成人的社会心理定势即社会态度。决定态度形成的根本因素是人的需要和价值观，态度对象对人的需要可能满足的程度以及人对此所作的判断，是人对态度对象采取什么态度的根本因素。“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缘故的根本之点就是态度对象对人的利害关系以及人对这种关系的认知。处于一定社会结构中的人的各种需要和利害关系是客观存在、相对稳定的，所以大众传播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对人的社会态度的影响只能是一种催化剂似的助力，而不是根本动力，决不能夸大大众传播的作用。大众传播只有在对人们对有关利害关系的认知产生影响时才能影响人们的社会态度，然而这并不是是一件轻而易举能立竿见影的事。

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认知和情感是构成社会态度的两个最重要的心理因素。大众传播通过一定的信息传播活动是可以对人的认知结构和情感倾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的。但是有一个重要前提：大众传播通过新闻报道所传递的事实性信息必须是真实、全面、客观的，它通过新闻评论所传递的意见性信息必须是客观、公正、合情合理、能说明现实的，它通过文艺手段所传递的情绪性信息必须是真情实感的反映，不可是虚伪的矫揉造作。归总一句话，大众传播的信息传播活动必须严格遵循“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经得起公众和客观事实的检验，决不能虚构造假、以偏概全、主观武断，否则不仅不能有效影响公众的认知和情感，甚至

还会适得其反，遭到公众的鄙视和唾弃。要知道，公众也许会被欺骗于一时，但决不会被长久欺骗；你可能长久欺骗极少数人，但决不能长久欺骗大多数人。这是历史的铁律，不可忘记。何况今天已是互联网时代，企图封锁消息蒙骗公众已决不可能了。我在相关研究的多篇论文中从不同角度充分论证了这个观点，为此我感到由衷地高兴和欣慰。我愿以此作为我对中国新闻事业的献礼。

（2014年7月）

目

录

一、自由读者——报纸的要素	1
二、从江苏受众分布看新闻传播的普及问题	4
三、略论农村的新闻传播	11
四、经济报道的改革与新闻业的大趋势	33
五、论新闻改革的必要性及其方向	44
六、舆论宣传的困扰和出路	55
七、新闻传播的两类效果及其形成机制	70
八、大众传播与社会文化	80
九、社会控制与大众传播	91

十、舆论监督与政治民主	100
十一、十三大同步新闻宣传效果调查	105
十二、新闻传播效果研究报告	115
十三、序陈崇山《受众本位论》	155
十四、热线电话节目传播效应探微	164
十五、从孟城驿遗存看古代邮驿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170

自由读者——报纸的要素

戏剧有三要素：剧本、演员、观众。没有观众就不能成为戏剧。那么报纸呢？它的要素有几？至今还未见有专家学者对此作过论述。不过我想，读者总该是它的要素之一。因为没有读者的报纸是不可想象的。

一种印刷品，一种读物，总是为某种特定的人或人们的某种特定需求而制作的。教科书是专为学生编写的，文件是专发给下级组织和干部、党员阅读的，报纸是专为读者而办的。

学生之于教科书，干部、党员、下级组织之于文件，读者之于报纸，具有各不相同性质的关系。学生不读教科书不行，不然，考试就不能通过，就不能毕业。干部、党员、下级组织不读文件不行，不然就不能懂得政策精神，工作就做

不好，甚至会犯错误。所以，学生、干部、党员之“读”，包含一种强制因素，非读不可，不读不行。报纸读者则不然，他不受任何强制。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完全的主人，是自己的主宰，可以十分（不是九分）自由地选择读他所需要所喜爱的任何报纸和报纸上的任何内容，也就是说，他可以读这份报不读那份报，也可以只读报上的这个内容而不读那个内容。这一切都由他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而决定。对报纸来说，他是真正的无上权威，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强制他读什么不读什么。如果报纸不细心体察他的脾性和爱好，对他来说可读率很低，报纸就会得不到他的青睐，就会有失去他这个自由读者（我姑且杜撰这个名词）的危险。失去自由读者，报纸的社会存在也就大成问题了。所以我认为，自由读者是报纸的要素之一。自由读者的多少永远是衡量报纸社会价值的一项重要指标。

然而缺少自由读者或者不重视争取自由读者的报纸并不少见。它们的存在，主要不是靠读者的支持，而是靠上级拨给的事业经费，靠公费订阅。这样的报纸，部分地或基本上已不是新闻学意义上的报纸了，只不过徒有报纸之名，实为别的什么印刷品罢了。

我们的报纸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应有思想性、指导性，引导人们循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前进，这是社会主义报纸担负的光荣使命，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报纸应用什么方法去贯彻这个宗旨，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也应有党性、思想性，但它必须通过独特的文学艺术手段来实现。报纸也是如此，也应有自己的独特的手段，独特的工

作方法。不然，报纸又何异于文件、教科书？

我认为，这独特就在于它的一切传播从内容到形式都必须适应自由读者的需求（对报纸来说主要是对各种新闻信息的需求）和兴趣，并时时根据读者的反应不断调整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他应该成为读者称心的参谋、知心的朋友和忠实的仆人，而不是指手画脚的上司。唯有这样，报纸才能受到读者的衷心欢迎和爱戴，在人民群众中生根，发挥它社会舆论中心的作用。

党报、机关报的严肃性、指导性并不注定要高高在上板着脸孔说话。翻开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就可发现，它是那么平易近人，处处以人民的勤务员姿态出现，同时它又旗帜鲜明地向人民群众宣传了党的主张。当时，许多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冒着被国民党特务监视、逮捕的危险阅读它、传播它。它是党性很强的党报，同时也是道道地地新闻学意义上的报纸。它依靠自己为读者的忠实服务取得了读者的信任和支持，从而能巍然屹立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独树一帜，把党的声音传送给人民群众，使党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所以，我认为，如果办报人心中很少想到普通读者的需求和兴趣，忠实地为他们服务，只考虑能否得到少数人的赏识，是不可能办出一张真正新闻学意义上的报纸的，也就是说，他所办的报纸是没有生命力的。

（1983年5月）

从江苏受众分布看 新闻传播的普及问题

1983 年秋天，江苏省新闻学会对全省城乡居民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的情况作了一次大规模的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在全省十三岁以上有视听能力的居民中（以下凡称居民，均指这个范围），有 94.58% 的人听广播，天天听经常听的有 68.16%；有 64.54% 的人看电视，天天看经常看的有 24.78%，有 54.50% 的人读报纸，天天读经常读的有 29.12%。居民中有 72.34% 的人同时接触两种以上新闻传播工具，既读报纸又听广播又看电视的有 44.86%。新闻传播的接受者包括了男女老幼，各行各业的人，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占 70% 左右。这一事实说明：新闻传播的影响十分广泛，绝大多数居民都在它的影响之下，居民的主体——工农劳动群众是新闻事业的主要服务对象。

调查结果还表明：报纸、广播、电视这三种新闻传播工具在居民中的普及情况是不一样的。广播的普及率最高，在居民中影响最大。不听广播的人只占居民的 5.42%。据调查资料统计，广播听众人数为报纸读者人数的 1.75 倍，为电视观众人数的 1.47 倍，稳定听众为稳定读者的 2.34 倍，为稳定观众的 2.75 倍。这说明：广播的普及程度和普及质量都高于报纸和电视。报纸和电视相比，普及程度后者高于前者，普及质量则前者高于后者，这一状况在三者传播新闻的作用上也反映出来：靠听广播了解国家大事的人数量多，占居民的 57.21%，靠读报纸的只有 15.20%，靠看电视的最少，为 9.42%。在不同居民中新闻传播的普及情况也是不平衡的（见表一）。广播由于总的普及率较高，因而在不同居民中的普及率差异较小，比率极差只有 6.61%。

表一 不同居民中的新闻传播普及率

居民类别	报 纸		广 播		电 视	
	读者 (%)	稳定读者 (%)	听众 (%)	稳定听众 (%)	观众 (%)	稳定观众 (%)
男	68.06	36.97	97.21	71.68	70.32	26.48
女	38.89	16.32	91.16	63.57	57.08	22.62
工 人	76.45	44.31	97.07	71.10	86.69	43.02
农 民	39.10	14.71	93.39	65.65	49.63	12.99
知识分子	97.87	84.04	98.94	88.30	81.91	44.68
干部	100.00	87.05	100.00	88.49	97.12	62.59
城市	87.93	65.75	97.94	79.39	95.59	68.01
集镇	76.79	56.04	96.46	75.66	88.35	47.34
农村	47.06	20.66	93.87	65.65	57.27	15.99